

【文学艺术】

跨文化交际中的异域文化发生层面

卞宗昌

(长安大学 外语部, 陕西 西安 710064)

摘要: 熟悉东西方文化差异, 是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条件。从异域文化的历史发生层面、系统发生层面和现实发生层面来展示跨文化交际中不同层面的文化差异。

关键词: 异域文化; 发生层面; 跨文化交际

中图分类号: G1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02)02-0064-03

Gradations of Foreign Culture in the Cross-culture Communication

BIAN Zong-chang

(English Department,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China)

Abstract It is very essential to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West and East in the smooth cross-culture communication. It argues about the communicative conflicts frequently happening in the different gradations of such as history system and reality, which can help the readers a lot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al difference and in the smooth cross-culture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foreign culture; gradation; cross-culture communication

按照文化人类学家观点,文化构成:(1)技术、经济系统;(2)社会系统,包括阶级群体政治、法律教育风俗;(3)个人系统,包括世界、宗教信仰、艺术创造、价值观和思维模式等;(4)语言系统。后三种在不同文化中表现差异很大^[1]。这些差异不仅表现在日常生活交往和语言形式如英汉词语、成语意义和运用方面的表层结构上,也表现在思维模式、人际关系以及言语表达方式的深层结构上。

所谓文化异域性,实质上是跨文化交际中一方对他方文化的一种解释。异域性并不是一种性质或状态而是对他方文化感知和解释的结果。不同民族由于历史与地域等原因,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从语用的角度来看,不仅体现在历史的层面,体现在文学、艺术和哲学等意识形态的系统层面,而且也体现在日常交际情境下的个人或群体的言行举止的现实层面。随着国际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日益广泛和深化,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了解东西方在历史、系统及现实发生层面不同文化所具有的差异性,有助于

保证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

一、历史发生层面

对历史知识的了解有助于人们对于他方文化的思维和行为重新建构,虽然这个建构过程是以有距离的观察角度为前提的,但是,这种视角可以让人们看到事物的全部。了解并以异域文化的视角来看待问题不仅有利于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而且对于认识和评判己方文化也具有重要作用。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自然和人体的特征;二是社会和文化的特征^[2]。对于前者,虽然人的形体和器官方面的差异,似乎令人一眼看上去就会产生陌生感,然而略加仔细观察便不难发现,对人体差异的感知并不一定就会产生陌生感。因为它只涉及人体外貌特征,而着重从个人品位的角度来看,对外貌的欣赏往往是由于对方与自己不同。

关于社会和文化类差异特征,也有类似现象。不

同的衣着、起居、饮食习惯及行为,有时被看作识别一个人或群体那些引人注目的文化特征的标志。

从历史上看,东西方传统思维模式对一些概念的定义所带有的歧视是根深蒂固的,时常在跨文化交际现实中表现出来。在欧洲所谓的文明史上,人们能找到那些不平等的概念:“希腊人”和“野蛮人”(古希腊对别的民族之贬称)、“基督徒、异教徒”、“人、非人”、“文明人、劣等人”等。

在一些学科领域,概念的表述至今仍带有消极的色彩:在法学领域里,异乡人是指那些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而没有居住国的国籍,并与该国存有待于查明的法律关系的人员。社会学将异乡人视为“边缘人”或者“介于两者之间的人员”。在宗教和文化史中,尤其在发展的早期,异乡人是指那些令人望而生畏的讲外语的陌生人^[2]。

“我族中心主义”是世界上所有民族的共同特征。翻开中国历史,1840年以前,中国具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根本无需提及其他的高级文化。中国就是“中心”,是高高在上的“天朝”。在中国人心目中,周边国家依然处于原始状态,还没有进入“人之道”,故以禽兽视之。鲁迅说:“中国人对于异族历来只有两种称呼:一样是禽兽,一样是圣上。从没有朋友,说他也同我们一样的”(《热风》《随感录·四十八》)^[3]。

二、系统发生层面

按照文化心理学的研究,每个人在对自己内心世界、对周围的人及周边环境所有的愈来愈深的了解,是通过一定手段和交际方面的行为经验进行主观加工而获取人际交往能力的。个体的这种建构过程既包括主观建构与群体建构,也包括对业已存在的文化意义系统进行再建构。在跨文化导向系统中,这种建构和再建构过程受制于一定的文化模式或者遵循一定的系统——文化导向系统。这种系统指的是被某个文化的大多数成员认为是正常、典型和具有约束力的所有的感知、思维评判和行为方式。己方和他方的行为举止均可在该系统中得到比较合理的评判和调节。

在这个文化导向系统中,对双方文化的正确解释和对人际交往中的举止行为的分析是该系统非常重要的内容。对文化的理解是一个特殊的导向系统,因为在任何文化中,经过代代相传,在它的行为导向系统中形成了专门的、可称为文化准则的行为标准和评判标准。人们不仅仅是简单地感知周围的人与事,更重要的是带有评判和归结的性质。当感知、

评判和归结三个过程一起协调起作用时,就达到跨文化的理解,为进一步顺利进行跨文化交际打好基础。否则个人获得的己方文化导向系统发挥不了作用,同时无法准确预测来自异方文化的交际对象的行为。

在这个文化导向系统中,举止行为分析是在正确文化理解下,实现正确而成功地跨文化交际理解的重要保障。人们知道,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互交往是通过具体的行为来实现的。在这种不同文化相互交汇的交际情境中,交际者双方都必须通过互动达到自己的行为目的。为此,一方面必须调动双方的导向系统,对异方文化准则及其行为调控效果有所了解;另一方面还要求有能力去感知人和情境,评判举止态度以及联系异乡文化行为导向系统去体验情境。而这种跨文化理解的能力只能通过跨文化学习来获得,通过学习可以在不同文化导向系统中,做出有利于行为的效果组合,从而使交际成功。

东西方的不同文化导向系统基于各自特有的生活理念。西方生活理念是基于个人和社会相对而立的原则。个人自我实现的观念根深蒂固,Individualism是西方人的普遍接受的价值观。他们将其理解为“强调个人的独立性和创造力,任其自由发展不受或者少受社会、政治和宗教势力等的钳制”^[4]。其思维模式继承了伯拉图—亚里士多德顺序。其思想根源是基督徒的思维定式,即每个基督教徒与他的上帝之间存在的直接信仰关系。这在16世纪宗教改革之后得到广泛的世界性传播。按照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的生活理念,每一个人都从属于一个密集的自然和人际关系网。在这样的从属关系中,每个人不必面对他人和面对神灵去不断证明和证实自己的独立性。他追求的不是个人实现,而是所处生活环境内的自身修养。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偏重于直观、直觉、意象思维,以联想、比喻、象征和夸张为主,并对同一主题多次归纳重复,创造一种意境和语境,让读者去联系细节与主题之关系^[5]。他强调集体的和谐和相互依赖,不突出个人。把Individualism理解为“个人主义”,意思是一切从个人出发,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之上,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错误思想。其文化根源是源自社会和谐概念,即中国人对社会秩序的理解,社会秩序须同自然界万物一样和谐运作。

此外,文化导向系统的差异也使得东西方人对彼此性格特征形成一种“刻板印象”(stereotype)。东西方人们在相互交往中,彼此在了解对方方面都积累了很多经验。这些经验逐渐浓缩成某种特定的国

民性格,如“西方人的性格”或“东方人的性格”。这种性格一旦被理解和确定为某些固有的特征,便会对对方产生“刻板印象”及做出种种自以为是的评判。如西方人对东方人产生如下的“刻板印象”:权威式的家庭教育体制、封建式的经济管理、儒家伦理的严格训导及个性发展和残缺不全等。这些都是西方思维地平线上的现成解释模式,用来帮助西方人理解东方人身上那些与己不同的特征。同样,东方人对西方人“刻板印象”是对事、对人一概直言不讳,工作讲求效率及善于冲破阻力去实现自己的意愿;也包括:爱冲撞别人;与人交往时给人的印象是爱自以为是及不能体谅别人也不会照顾自己等。

三、现实发生层面

导向系统的差异也体现在跨文化交际中的现实层面。思维方式及价值观差异直接引起的社会交际观念、模式和表达方式。在人际交往中中国人喜欢试探且言辞婉转含蓄,为的是避免过于直露而给对方造成难堪,从而维护和谐的人际关系^[6];西方人在交际中注意显示自我,把人际交往看成是交流思想、传递信息方式,对对方脸面和双方协调考虑较少,强调直截了当问与答。从以下例子可以看出区别:

(一)礼貌原则

礼貌在学术界虽然被纳入“文化共性”的范畴,但在东西方理论和实践中,却常常因为礼貌问题而造成相互理解和沟通上的困难。所以在跨文化交际中,礼貌问题是双方共同的一个重要标准。

礼貌是调节社会 and 人际关系的重要范畴。在跨文化交际情境中,交际双方特别注意自己行为的正确性,并且特别注意突出那些从自己文化角度来看“优秀”的行为方式。例如,中国人同西方人交往和阐述自己观点时,常用“也许”、“大概”,对人好意或提供的帮助虽然非常愿意接受,却又总是一再推让等,这些在中国人看来努力采取的礼貌态度,意图是好的,但是交际结果正好相反。

(二)要面子

西方人在同中国人交往时对于中国人的行为举止表示出困惑。在他们眼里,中国人对于不能满足对方的期望表现出一种特别的敏感,特别担心自己的失误,即害怕丢面子。东西方文化都有面子问题,但是其内涵与外延却不同。

在欧洲文化中,“要面子”这一准则是着眼于个体的,针对个人及其行为,或者个体行为所处的情境。从文化意义上讲,对“丢面子”的自负其责被看作

是社会“自由”要素;从理论上讲,它则是为当事人提供悔过的机会。在东方,这一准则正好相反。它是以跨越个人的社会单位为导向的,从社会单位出发再引向每个具体的个人。它本身具有一种社会的建构力和维护社会的凝聚力。所以,在中国人看来,西方人要面子的做法是向他人展示并夸耀自己的脸面;而在西方人眼里,中国人则是通过掩饰自己的脸面来达到要面子的目的。

(三)口试

在西方,口试是检测学习效果的一种重要方法,其目的是让应试者面对的是一个随时使他受挫的情境,而就此做出最大限度地自我表现。如果他能顶得住挑战,就成功了。在中国人看来,这一行为情境似乎有意识让主考人与考生双方“丢面子”。实际上,当口试在某种情况下起重要作用时,“解决”丢面子的方法出现了;其一,可能动用双方关系,如事先打招呼。此时,口试流于形式;其二,通过考试过程匿名化或放弃面对面口试等措施。这些为东方人所特有的聪明“措施”,完全背离口试的真正意义,同时也使西方人不可思议。

综上所述,剖析东西方及跨文化发生层面,不是争论孰好孰坏、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有助于人们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使交际得以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前提。一方面,人们不能用在特定文化条件下产生的概念来对社会现象作“脱离文化”的分析,因为这些发生层面是历史和社会发展的产物,基于历史和现实意义的角度,去理解是可取的;另一方面,还应注意社会转型过程中交际层面发生的变化,如社会称谓问题、问候语方面及一些使用礼貌语言的行为情境方面的变化。

参考文献:

- [1] 张英凯.符号学与跨文化研究.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
- [2] 梁 镛,刘德章.跨文化外语教学与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 [3] 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M].西安: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
- [4] 萨姆瓦,等著,陈 南,等译.跨文化传通[M].北京:三联书店,1988.
- [5] 胡伟希.语言与存在.文化:中国与世界(2)[A].北京:三联书店,1987.
- [6] 潘文国.汉英对比译著纲要[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87.